

#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文化与社会洞察

《卢卡奇文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的作品集,精选翻译了能够代表卢卡奇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满足当代中国学术界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的阅读和研究需要。这部文集由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张亮教授及团队翻译,译者是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著名高校专业研究者,他们进行大量高质量的文献考订工作,使文集的翻译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

张秀琴(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构建中文语境卢卡奇思想研究的全景结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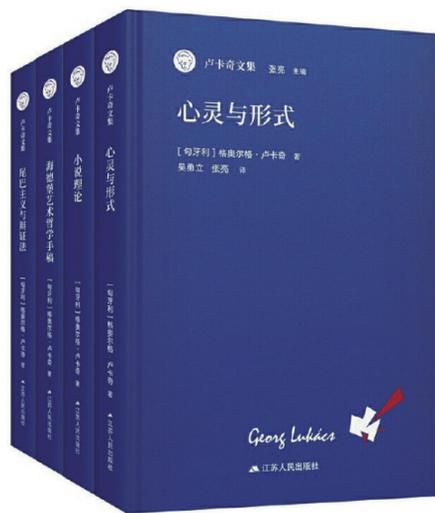
中文版《卢卡奇文集》(以下简称《卢卡奇文集》)的出版,是国内乃至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哲学界,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大事和喜事。

首先,《卢卡奇文集》的出版,将会为研究者提供更全面和专业的文献资料。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该文集早一点出版,我十多年来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语境的《阅读卢卡奇》(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的写作,就会减少很多文献(主要是德文文献)搜集、整理、翻译以及理解上的困难和障碍。因此,对于非德语母语的学者和研究者来说,卢卡奇经典文献的译介出版如同工具和眼镜一样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卢卡奇文集》对于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其学术功用和社会效果类似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之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同样不可忽视。

其次,《卢卡奇文集》的出版,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内卢卡奇研究的“孤岛式”现象。如果我们把卢卡奇一生的思想发展分为4个阶段,即20世纪10年代、20世纪20年代、20世纪30至50年代以及20世纪60至70年代的话,那么长期以来,第一和第三阶段(或者称“初早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实际上是被严重忽视的。因为人们多聚焦于第二和第四阶段,即分别以《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和《社会存在本体论》(1971年)为代表的所谓“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缺乏非德语文本的文献基础,当然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进而,这就很容易导致碎片式或“孤岛式”的研究状况。现在,张亮教授和他的专业团队组织出版的《卢卡奇文集》的第一批书目,恰逢其时地弥补了“早期阶段”的“空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个优秀的团队一定能用他们智慧的眼睛,从多卷本德文版《卢卡奇全集》中找到更多“中期阶段”的文本文献材料,并用信、达、雅的美学中文将它们表达出来,以飨读者。

最后,《卢卡奇文集》的出版,将会给国内卢卡奇思想研究界提供一个全景式卢卡奇思想画像的结构基础。我们知道,卢卡奇一生在美学(戏剧和诗歌等文学和艺术)和哲学(新康德主义哲学、黑格尔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之间“穿梭往返”。卢卡奇“初早期阶段”的“文艺青年”时期对“早期阶段”(特别是其物化理论)的影响是什么?“中期阶段”和“早期阶段”之间是什么关系?同是以美学研究为主的时期,“初早期阶段”和“中期阶段”之间有什么异同?只有根据文本理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之间这个在国内外学界似乎更被人们所热议的话题,即卢卡奇早后期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同时也提醒我们,这个问题,在脱离美学批判的哲学批判中似乎是很难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的,反之亦然。

需要注意的是,卢卡奇思想早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多以文学(或文艺批评)方式(如以“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为题)进入中文语



《卢卡奇文集》(匈牙利)格奥尔格·卢卡奇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

境,之后,在20世纪下半叶著名的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大讨论中更是积极地介入中文语境(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相关话题的探讨。相信,国内学界近一个世纪的探讨,并非源于一种所谓狭隘的学科意识(无论是美学的还是哲学的),而是理论工作者对自己所身处的时代和历史的体验和表达,是自己的时代的物质生活和生产现实在概念、范畴和问题意识上的体现。

通常我们把卢卡奇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视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学者们也常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从20世纪2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研究,都绕不开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而《卢卡奇文集》的陆续出版,将会为我们对这些断言的认定以及规定性设置,提供更多的材料支撑。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虽然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都是对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他毕生致力于坚持和完善自己所认为的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和实践品格,无论如何,是值得尊重的。

总之,卢卡奇是我们理解在马克思身后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回到马克思”的西方左翼学者群体中一个不可忽视也不可绕过的重要历史人物。由他所开创的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视野,如同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工作一样,一直持续至今,并深刻影响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与接受的历史与逻辑历程。今天,我们身处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只有批判借鉴国外学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特别是这一批判的坚实的文献基础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扎实理论功底,才更有可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学术深度和人文关怀温度的学理支撑。我相信,这也是《卢卡奇文集》的目的和归宿。

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基于文献编译透视卢卡奇的思想全景

卢卡奇的思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产生了复杂影响。直接地说,他的文学艺术思想(特别是文学现实主义观和文艺社会学方法)以及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现代社会物化的判断,一直是相关研究的重大前提性理论,间接影响更复杂,因为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奠定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基础,并极大地影响了包括我国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叙述。同时,卢卡奇本人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理论家案例,卢卡奇的理论轨迹记录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匈牙利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曲折探索这一复杂而曲折的革命形态中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命运。在对卢卡奇致敬的过程中,需要对其理论生涯进行全景透视,中文版《卢卡奇文集》(以下简称《卢卡奇文集》)的出版可以说是正当其时。

在此,我希望以《尾巴主义与辩证法》为引稍许展开对《卢卡奇文集》第一辑作品的学术和理论价值的评论。我们都将《历史与阶级意识》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但是,这是根据其效果史形成的定义,质言之,这是一个历史的建构,其与卢卡奇的原初意图并不是一回事。出版这本书,是出于卢卡奇作为无产阶级理论家对欧洲革命和无产阶级命运的关切。在批评与反批评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反对派”被建构出来。与在理论上具有进攻性的德国共产党理论家卡尔·柯尔施不一样,卢卡奇对批评表现出相当的克制,进行了自我反思。但随着政治和理论环境的起伏,卢卡奇多次进行自我批评而又多次“反悔”,甚至让人怀疑其自传的真实性。事实上,卢卡奇对于批评是认真对待和有深刻见解的。他留下的反叛德波林和鲁达什批判的《尾巴主义与辩证法》手稿便记录了这一点。在自我辩护的过程中,他不仅清晰地阐明了其整个《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理论建构所回答的问题,而且表明了其对列宁主义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等重大策略问题理解的正确性和深度性。这也为我们理解后来对全部20世纪激进思想有着重要影响的物化理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照。在卢卡奇之后,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批判方面似乎更深刻了,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假借物化

世界上的运河很多。许卫国的新著《运河三部曲》写的是隋唐大运河。它延续千年,纵贯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的8个省市,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设工程,成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2014年6月22日,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3大部分10段河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我认为,人类文化遗产,可分为“死了的遗产”和“活着的遗产”。所谓“死了的遗产”,是说它虽然还存在着,但已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所谓“活着的遗产”,是说它不仅存在,而且还还保留和发挥着原有的功能。隋唐大运河无疑是“活着的遗产”。它虽千岁有余,而如今,远远望去,碧波荡漾,白帆点点,一派生机勃勃的繁忙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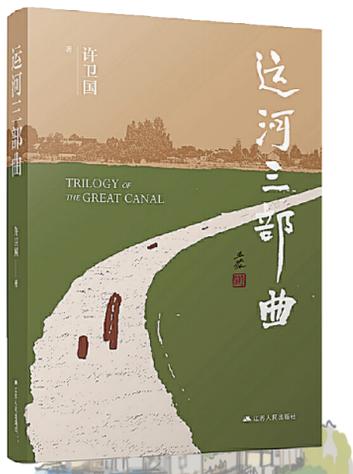
在作家笔下,运河之“活”,并非仅仅是“为有源头活水来”,更是生生不息、永远活着的“运河之人”“运河之乡”,正如书中开篇的《运河谣》所唱:“运河的水呀运河的浪,运河是我们再生的爹和娘,血管里流着运河的水,生就了前进的双脚,不弯的脊梁。运河的水呀运河的浪,运河两岸是我们可爱的家乡。你我都是运河的人,就像那绚丽的浪花,迎着风雨开放……”

人类挖开了大运河,大运河回馈于人类。运河两岸的人民就像隋唐运河一样,躺在大地的怀抱里,仰望星空,向太阳,向苍穹。他们始终不忘本来,憧憬未来,脚踏实地,在曲折中前进;他们是风雨中开放的浪花,是你追我赶的潮头。他们中有官吏政客、军阀侠客、名流骚客、商贾富豪,还有人民群众、平民百姓。人民群众才是大运河真正的儿女,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

书中,作者把主要笔墨用在平民百姓身上,重点刻画了3位女性,写她们春潮澎湃、大起大落的人生,写她们浪花飞溅、惊涛拍岸的人生,写她们坚贞不屈、奋力前行的人生……写人生就是写

## 古老运河见证「新山乡巨变」

章剑华



《运河三部曲》,许卫国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精神,唯有精神如千里运河万古流。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隋唐大运河,它的传承发展,主要是人的传承发展、精神的传承发展。作者抓住了“运河之魂”的主题。有了这个魂,作品就立得住、立得住。当然,除了主题鲜明、立意深刻外,作品的情节曲折跌宕,人物栩栩如生,语言鲜活生动,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也不乏新鲜的时代气息。

《运河三部曲》中的“三”,即“运河之魂”“运河之春”“运河之根”三部分。我以为《运河三部曲》并不是就此“三部”,而是“多部”,更是“诗与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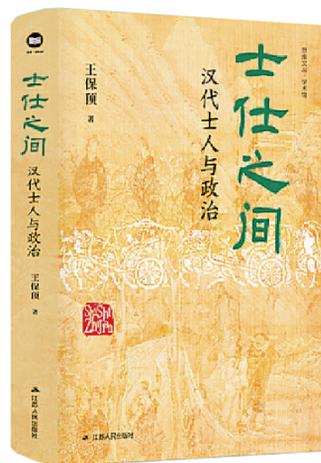
我们向故乡弯腰,才能挺起脊梁。我们从故乡出发,才能走向远方。有大地,我们就能播种希望,有双手,我们就能建起人间天堂,有汗水,就能汇成幸福的海洋。

(作者系江苏省文联主席,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 追寻汉代士人的心路历程

——评王保顶《士仕之间:汉代士人与政治》

刘风华



《士仕之间:汉代士人与政治》,王保顶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

亡,仅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大一统,文化思想层面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汉承秦制,至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才一举占据主导地位,这其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汉初平定天下后,如何维持王朝统治,即以何种政治模式统御天下,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严峻考验。刘邦起自草莽,以五德终始说为权宜之计,却造成了统治理论的混乱。逐渐走向政治中心的士人在这一问题上当仁不让,董仲舒、陆贾、贾谊等士人代表就汉承何德即政治模式的选定上发表过不同意见。最终董仲舒的“天人学说”脱颖而出,为汉武帝所采纳,进而成为中国古代王朝统治的理论基础。董仲舒所论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以天人合一为汉代统治寻求合理性,皇权成为上天旨意在民间的代言,规范了社会秩序;二是天人感应,以民为本,借灾异预警,把天降灾异喻为民意的反馈,借此约束君权。董仲舒的理论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托的,自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并融合了阴阳、法家等其他流派,呈现了当时思想领域从驳杂到统一的过

程。董仲舒不仅提出了学说理论,也提出了改造政治的具体途径,即变士人为儒士,以儒士身份参与政治,以所学抱负对政治进行改造。这也促使了儒士逐步走入政治舞台的中心,进一步推动了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加速了士大夫阶层的形成。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阐发,民本论实乃中国自古有之,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原生理论。董论以灾异为媒介,将天降灾异比作衡量政治状况的标尺,使客观现象灾异具备了政治调节的功能。其一,对君主政治进行调节,皇帝见灾异示警,罪己而内省,群臣进言,对政治之失及时修补;其二,理顺了王朝更替的内在逻辑,为王朝平稳迭代提供了理论依据,故新莽时期,士人多附。附录论文《汉代灾异观略论》考察了灾异观的实质、功能及意义,揭示了灾异论背后的政治意图,指出灾异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应注意到士人运用灾异论喻君主的政治设计,不应一概归为妄言。

陈寿《三国志》言,蜀汉“国不置史,记注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蜀汉没有专任官员记录灾异而为史家所批评,可见记录灾异对王朝政治的重要性,这一点从《汉书·五行志》及后世正史均延续五行志也可得见。由此,作者进一步指出,借灾异讽人事,政治权衡的立足点和归宿始终围绕人事、民本,故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虽为君主专制,却并未走向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君权神授。可以说,民本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不同于西方神权论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积极特质之一。

一如作者在书中指出,两汉既是中世纪政治制度奠立的时代,又是中世纪文化思想形成的时代,故中华文明的实质性源头在两汉。对于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史家论说不断,学术成果堪称丰富,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汉代的相关研究仍有待深挖和阐发。《士仕之间》从士人与政治的关系切入,借此探究两汉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嬗变,言之有据,论说精当,或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更多理性思考与新的启示。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